

人间

忆章兵哥

孙景璞

章兵哥比我大一岁，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务农。他心灵手巧，多才多艺，有很多故事。

一

章兵哥17岁时曾在油房内做过一段“榜垛”(音)的活。俗谚曰：“冷粉房，热糖房，不冷不热上油房。”虽然油房内不冷不热，但是刚蒸熟的豆坯还是热气腾腾的，怪烤人。榜垛人穿着背心、短裤操作：把15公斤重的熟豆坯压缩成厚约12厘米的饼坯，搬到油压机底部。要重复做完6个同样的饼坯，垂直垛在一起，才能加压榨油。这是一个力气活，也是一个技术活，要趁热操作，如果时间拖长，豆坯凉了，出油率就会低。油草包得不密不匀，也会挤漏豆坯，影响出油率。章兵哥因为年龄小，力气不够，干了一段时间就辞工了。

章兵哥天资聪明，在干农活的同时，无师自通，竟然成了一名泥瓦匠，农业合作化时，还担任过大队的建筑队队长。他带领队员们为集体建起了冷库、养鸡场、贝雕厂、办公室等，还为许多社员修旧房、盖新房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他们讲信誉，保质量，为社员着想，方便了群众，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和赞扬。

1971年春，他带领队员们为我家翻新五间北屋。这个房子三面临街，没有遮掩，要求处处上线棱角分明。前檐墙是三层丈石块，垒得是块块石头垂直，条条灰缝明晰。后檐墙垒的是五层拽子石块，每块石头砌得牢实，线条平行垂直。东西两个山墙垒的是乱叉石，把大小不等、边角不规则的石块砌得严丝合缝，结结实实，几乎不用泥缝。门窗边角和四个外墙码头，都建得上线上拐，清晰美观。我家这五间砖瓦房建成后，路人常说这房建得结实，堪称样板。

二

章兵哥不但技术好，干活麻利，还有较高的指挥能力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村的建筑队在周围村庄中小有名气。县公路局都看中了他们的技术和施工质量，1978年把加宽烟滩公路北十里堡大桥的工程交给了他们。大桥是四洞石拱桥，横跨东庄河，高约10米，每洞原宽度4米，总长约30米，现在要加宽4米。这是一座质量安全可能事关百年的大桥，技术要求精，质量要求高，施工难度大。他们队当时只有一台拖拉机和一部分木杆木板脚手架，什么机械也没有。他们全靠肩扛人抬，用手锤、铁钎来破石、凿石。工地离家三四公里，他们每天朝出晚归，在露天下风吹日晒，在高温下劳

作，任劳任怨，艰苦奋斗。

农历七月七日，正当人们欢度七夕的时候，章兵哥的二儿子在工地上突患急疾，抢救无效去世。这一噩耗，犹如晴天霹雳，震惊了全村，工地停工三天，大队干部都到章兵哥家慰问，并帮助处理后事。章兵哥悲痛至极，但仍牵挂着工地上，第五天就回到了工地。全体施工人员大干两个月，提前8天完成了预定任务。经县公路局验收，各项工程指标都是优。

翌年，他们又接受了加宽河崖桥的工程任务。该桥是双洞石拱桥，总长20多米，高4米多，在原来7米宽的基础上再加宽3米。工地离家二三十公里，吃住都在河崖村里，生活更艰苦。但是他们有了建十里堡桥的经验，信心十足，全队团结一心，不怕苦累，一个半月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，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，为建筑队争得了荣誉。

三

章兵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每年春节，他都参加村剧团演出吕剧、歌剧，有时还兼任导演。过去的春节习俗，各村都有文艺演出，而且互相交流，一直演到元宵节。他擅长演老生，有时也演其他角色。他曾主演过吕剧《姊妹易嫁》《马大保借闺女》《丰收之后》《三世仇》等。他演技出众，在四邻八村小有名气。小孩子特别崇拜他，有人叫他“马大保”。

章兵哥还爱好书法，练就一手大楷毛笔字。每年秋冬季节，章兵哥会书写大量的春联，到集上去卖。他写的春联字迹苍劲圆浑，有骨气，墨色黑中透亮，挂在集上，格外醒目诱人。他对春联内容也慎重选择，除了吉祥喜庆欢乐的语句外，还采纳一些内涵高雅、紧跟形势、充满正能量的联语。所以，他写的春联卖得火，收入也很可观。他说：“我干了半辈子重活，老了也闲不住。写春联也是一种劳动，可以手脑腿脚并用。骑三轮车赶集更是一种锻炼，对我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。”

多才多艺的章兵哥，晚年生活也很快乐。他不卖春联了，还骑着三轮车赶集，体验新生活。他还关心国家大事，除了看电视，还爱读报纸，经常向我要看过的报纸杂志，并和我交流他的心得体会。他说：“人老了，思想不能老，跟上新形势，活得才有滋味。”

遗憾得很，操劳一生的章兵哥，在2018年的一个早晨突发急病，抢救无效，几天后就辞世了。噩耗传来，我悲痛多日。

“平凡亦有光，劳动最光荣”，我认为这可以作为对章兵哥的评语。

长姐如母

风铃

我们几个弟妹之所以夸大姐是世上最好的大姐，是基于以下理由。

首先是她有“长姐如母”的风范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父母在北方一个城市干苦力，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大姐。做饭不难，大姐早在五六岁就学会了，她踩着板凳做饭的形象至今在我们头脑中挥之不去。关键是她还有三个弟妹，我最小。可以想见，一个什么事都不懂、衣服要别人穿、大小便要别人管、饭要别人喂的二三岁的孩子，对大姐意味着什么。但这还不是最难的。据大姐讲，小时候的我似乎有多动症，没有闲着的时候，她怕我摔着磕着，就到处追我。一天下来，大姐的身上嘞嘞湿(音，胶东方言，意为全身湿透)。

父母披星戴月地干活，等他们回到家时，我们基本已被大姐哄睡了。因此，幼时的我们几乎不怎么与父母见面，对大姐却十分依赖。有时即使父母在场，两个姐姐要扎什么发卡、我穿什么衣服，还有与邻居孩子发生了什么矛盾，都会径直找大姐。有一次临近年关，父母太忙了，把大姐叫去临时帮一天忙。走时，把我们三个锁在家里。那一天，我们三个丢了魂儿似的。我嗓子眼好像含了个知了——唧唧了一整天，硬喊着“要大姐姐”。两个姐姐则像火燎了屁股，一趟趟往窗台爬，脸贴在玻璃上，眼巴巴瞅着大姐回来没，差点让玻璃把鼻子挤扁了。由此不难看出大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准确地说，我们几个弟妹都是大姐带大的。

后来父亲回到烟台工作，我们全家人也回到烟台乡下老家生活。母亲长年有病，其他弟妹刚处于童年，因此农活全落在了大姐身上。大姐那年刚15岁，从没接触过农活，农具叫什么、如何使用更一无所知。大姐从最基础的农活学起。农村活没有一样是轻松的，比方用锄头刨地瓜、苞米，用锹施肥，都很重，但这些都不如割麦子耗费体力。大姐干活泼辣，舍得用力气，很快便成了村子里的割麦子能手。

还有些活既需要有力气，又有技术含量，像用耧播种、用犁耕地以及用独轮车推粪运粮食，这些差不多都是男人的活，会不会干这些活是判断是否整劳力、能否挣十个工分的关键，生来好强的大姐硬是学会了。耧和犁不用说了，经过一两年历练，大姐干得得心应手。我们村的地都集中在一个叫南港的地方，到那里须经过一段最窄处仅二三米、路两边都是直下陡坡的“悬崖路”。在这里推小车，连老把式也要

小心几分。大姐推车技巧没得说，但是比起那些推独轮车的大汉们，她的力气实在小得可怜，难以掌握车子的平衡。从推车那天开始，她摔下“悬崖路”的遭数不计其数，光我亲眼看见的就有二三次，她身上总是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最严重的是那次运苞米秸，她的胳膊摔断了，在家里躺了足足三个月。这段路也成了大姐的梦魇。口粮分配与工分成正比，而家里工分都是大姐挣的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大姐是我们家地地道的顶梁柱。

我们全家进城后，大姐进厂就业。我们几个弟妹读完书后，面临进入社会这一关键期，是大姐扶了菜鸟弟妹们一把。我们的工作，不是大姐介绍的，就是她帮忙拿主意的。二姐小学毕业后，赶上一家事业单位招聘会计，二姐因没有财会方面知识，有畏难情绪，大姐曾干过出纳，就利用业余时间教二姐会计学基本原理，结果二姐如愿以偿。兄妹中属我学历最高，大姐让我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，给家里争气，但我高三毕业时恰逢“文革”，大学梦破碎。后来我要去当兵，父母担心我这个独子受苦受累，从中阻挡，最终还是大姐说服了父母。后来，我在部队提了干。实践证明，大姐的意见是对的。

另外，我们姐妹们的婚姻也都听从了大姐的意见。二姐和三姐的对象户籍当初都不在烟台，一个在福山、一个在栖霞。当年户籍与人员不允许流动，他们不在一地生活且不是城市户口，但大姐认为两个妹夫为人忠厚老实，妹妹嫁了这样的人，没有错。事实证明，二姐三姐婚后的确很幸福。小妹是老生子，父母溺爱，对她的婚姻更是牵挂，后来，小妹跟本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恋爱，并把他带回了家，得到了父母认可。但在一次民兵投弹练习中，小伙子被手榴弹砸伤，住进医院。父母一听翻毛了，担心这孩子一旦被砸坏了可咋办？大姐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，亲自去了妹夫单位。回来后，她告诉父母，小伙挺好的，活蹦乱跳，还是厂子里的重点培养对象，父母便同意了。后来妹夫当上了厂子的技术厂长，他们的孩子博士毕业后，分别担任某银行驻美国、驻香港分部的负责人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父母年龄大了，去哪儿养老、怎么养老，兄弟姊妹意见不一，最后还是“主心骨”大姐一槌定音，去她家养老。

如今大姐年近九旬，弟妹们有事仍爱与她商量。我们在祝她长命百岁时，也许下心愿，下辈子仍与她做手足。